



近代中国实业 救国思潮研究

Jindai Zhongguo Shiye Jiuguo Sichao Yanjiu

蔡双全 著



近代中国实业 救国思潮研究

Jindai Zhongguo Shiye Jiuguo Sichao Yanjiu

蔡双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蔡双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004-9512-3

I. ①近… II. ①蔡… III. ①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886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邀编辑 王清淮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教文蔚*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不断掠夺和侵略下，中国国力逐渐衰弱，甚至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遂成为先进中国人必须解答的首要问题。于是，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军事救国等多种救国方案应运而生。但究其实质，这些方案不外乎两大类：或者强调中国首先必须进行一场政治革命，在政权形态上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扫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在解除了日益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之后，才能真正着手发展生产力；或者强调必须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方能最终战胜西方列强的掠夺和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这两种方案犹如医家对于沉痾日久的患者所开出的两种药方：一是须先下猛药，祛除病魔，才能挽救患者生命，然后徐图康复和健壮；一是须先培本固原，改善患者体内各类系统，以调动、增强

*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原副会长。

其自身机体的功能与活动，方能安泰吉祥。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思潮与实业救国思潮是这两种救国方案各自最完备、最深刻的体现。蔡双全的《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就是一部专门研究第二种救国方案的著作。

多年来，蔡双全有志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学习与研究。几年前，他刚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正在考虑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感政治经济思想的嬗变也应属于这一转型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由于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史学界对于实业救国思潮，缺乏充分的研究和适当的评价，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遂嘱咐他在这方面多加思考。随后几年，蔡双全不负厚望，在辛勤搜集、梳理与消化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博采各学派之所长，呕心沥血，撰写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有关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的首肯。继之，他又趁热打铁，继续汲取中外学者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深入探寻和考订相关资料及文献，进一步思考与推敲各种理论与观点。在此基础上，对原稿进行了“伤筋动骨”的修改，屡易文稿，最终完成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的书稿。在其付梓之前，他嘱余作序，现将几点阅后感叙述如下。

首先，蔡双全之作比较科学、完整地“对‘实业救国思潮’做出了一个清晰的界定。

蔡双全指出，从词源学来解释，“实”的本义为“富”。据《说文·宀部》：“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实业”由“实”和“业”两字组成，为“求富的事业”之意。“实业”有何根本意义呢？《管子·治国》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发展实业即生产力，使人民富足，乃国泰民安之上策也。在近代中国，所谓“实业”，从外

延来说，它不但涵盖了各种工业部门，而且，举凡现代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甚至围绕上述生产活动展开的教育和服务行业，亦应一概包括其中。更重要的是，“实业”一词的内涵，就其本质而言，不应仅仅指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而主要是指这些生产活动是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下进行和完成的。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发展实业就是意味着实现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就是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化。在近代中国，所谓“救国”，它不再仅仅是指挽救或中兴某个日益衰败的封建王朝，甚至不再仅仅是指单纯地抵御、战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与奴役，而是要求古老而又落后的旧中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以期建立起和巩固住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近代意义上的新型主权国家——这种国家根据近代国际法准则，平等地和其他主权国家并立于地球之上。所谓“思潮”，则并非单指某一历史人物的思想，或某一学派的理论，而应该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阶层的要求、欲望、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而且，这种思想必然在民众中能够取得广泛的共鸣，启迪、促使和组织起广大民众自觉地行动起来，对历史进程发挥出显著的能动作用。归纳起来，“实业救国思潮”就是指在西方列强的掠夺和侵略下，先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敏锐的、务实的、具有近代观念的分子和从事工商业的人士，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进而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的一种思想运动。其主要特征与实质就是把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放在首要地位，使之成为塑造一个自立于世界近代文明民族之列的近代国家的基础。它所包含的中华民族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以争取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蔡双全对“实

业救国思潮”这一较为科学、清晰的界定，为全书的立论和阐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蔡双全之作依次按照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清末、民初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等五个历史阶段，来展开对于实业救国思潮的叙述和研究，这不但符合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而且符合思想史研究尤需遵循的基本要求。

众所周知，在历史的进程中，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必然会历经一个从时间来说由萌芽到生长到成熟，从内容来说由模糊、片面到日益清晰、完整的演变过程。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自然也不例外。据此，蔡双全对这一思潮由被动到自觉、由浅层到深刻、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揭示与解答。在论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所倡导的“师夷长技”思想时，他既肯定了这种思想振聋发聩的巨大功绩，又明确指出它并不包含近代意义上的“实业”观念；同时，由于林、魏等人仍囿于传统“华夷之辨”的民族观，他们的“制夷”并不具有近代化的国家观念。因此，林、魏等人所倡导的“师夷长技”虽然客观上为实业救国思想的孕育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实业救国”思想。随后，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官僚虽然创造和扶植了一批形式上的近代工业和民营企业，但这些企业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又因为他们举办洋务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已，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制度去取代封建制度——他们心目中的“国家”仍然与近代意义上的、按照国际法准则与其他主权国家平等相处的国家观念，有着一种本质上的区别。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洋务派官僚发起与主导的洋务运动，虽然为实业救国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契机，但他们的思想与近代中国的“实业救国”一说，不啻南辕北辙。蔡双全进而提

出，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这些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才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想的真正首创者。其理由是，在近代中国，谈“实业救国”，必须包含两个因素：对内要求变封建国家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外抗拒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质言之，就是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一方面要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这两者相互关联，互为补充，譬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而郑观应等人第一次将这两者有机地连接起来了，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想正式树起了旗帜。

蔡双全认为，“实业救国”作为一种得到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潮”，却是正式降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这一历史时期，“实业救国”思想，上得到了清朝统治集团部分人士一定程度的容许、支持，下得到了广大民众相当程度的赞同和支持，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时代思潮。虽然，实业救国思潮肇端于晚清，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但作为政府的一种立国行为，付诸于实践，则是民国初年的事。民国初期，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形势的巨变为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实业救国思潮从而发展到了高峰期。从实践层面看，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业部，直隶于临时大总统，管理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等。北京军政府在1927年7月撤销农商部，分设实业部，以管理商矿及其他实业行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12月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改组为实业部，至1938年初因国统区大大缩小，国家应对全面抗战而撤销，其事务由经济部接办。在金融方面，经四年筹办后，民国北京政府财政部于1919年4月正式成立中国实业银行，经营储蓄、信托、仓库及发行等业务。兴办实业还须有懂得近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1913年8月，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令》，规定此类学术以教授农、工、商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

的，在省、县及城镇乡或农工商会之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同时公布《实业学校规程》。兴办实业还要开展学术研究，1912年5月，中国实业会在北京成立，以“合群策群力，振兴全国实业”为宗旨。1917年12月，“实业同志会”在北京成立，以“联络实业同志，研究学术，力图实业发达”。在理论层面上看，民国初年，在经济立法、理财救亡、发达国家资本、实行保护主义和开放主义等经济思想方面^①，尤其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的提出，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仅包含了中国发展实业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以及发展重点等全局性问题，而且也涉及与发展实业息息相关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微观问题，真不愧为实业计划的集大成者。这对于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孙中山为创立中华民国，置民族主义为前提，取民权主义为途径，定民生主义为鹄的，第一次较成功地将民族民主革命与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统一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实业救国的思想与口号业已大大失去了昔日的新鲜感和煽动力，雄风不再，但在这一时期，学术界爆发的“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以及“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的大讨论，说明实业救国的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它的余波仍起伏不息。这两次大争论，从宏观上探讨了中国实业发展的方向性、战略性与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实业救国论的若干片面性、空想性和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乐观情绪。

蔡双全的上述研究思路与主旨，既追本溯源，讲清了实业救国思潮的渊薮、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又坚持了“实业

①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救国思潮”特有的历史含义，较好做到了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结合，既纠正了以往史学界或者将“实业救国”思想解释过泛，从而将历史地位和时代内容中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含混地相提并论之失误，又消解、弥补了若干论者或者将它解释得过于突兀、狭窄，从而截断了活生生的历史长河之偏颇和局限性。应该说，蔡双全的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和要求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和逻辑的统一。

再次，蔡双全之作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作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我们经常说，研究历史就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所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仅要求研究者客观地、公允地勾画出已逝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研究者应拿出胆识与勇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底蕴和价值，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揭示、阐发和评判。蔡双全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实业救国”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思潮，不溢美，不苛求，不虚饰，不臆测，而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评价。他不屑于机械地、粗浅地、轻率地以“革命与进步”，“改良与反动”这类标签来漫画历史，而是将实业救国思潮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

民主革命与以追求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实业救国思潮实为两大主调，合奏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壮丽乐章：革命者不畏牺牲、慷慨就义、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实业救国论者则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披荆斩棘。如果说，对于民主革命的肯定、赞颂、推崇，无疑成为了人们的共识，那么，对于“实业救国”思潮的价值，应如何评价，恐怕就有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因此，对于民主革命思潮与实业救国思潮的关系这一不容回避的难点问题，分析和阐述得是否科学、严谨、完整，不但将极大地影

响到实业救国思潮研究的成败得失，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势必影响到对近代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之正确与谬误。

蔡双全并不讳言：在政治上，实业救国论者绝大多数基本上都主张效法西方，兴办实业，用改良的、缓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改革内政，尽力避免采用激进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因而，在某些历史时期，民主革命思潮与实业救国思潮在若干方面确实多少产生过矛盾、冲突、抵牾——正如中国近代史早已昭示的——不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发展实业只能是行走蜀道、孤舟渡海；不首先解决政权问题，建立起一个民主的近代国家，则“救国”一说，无异于痴人说梦、水中捞月。但是，他又同时认为，这两种思潮也并非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从目的上讲，两者殊途同归，最终都是为实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这一艰巨任务而服务的。从理论上讲，要改变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性质，须从生产方式开始，而生产方式则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人们常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本是对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主观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殊不知，革命首要的、直接的是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进而解放生产力的。但解放生产力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及历史条件的，而实业救国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增长，不仅为当时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从长远或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它无疑在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巩固执政党地位和从事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这就是“资本主义越发达，对社会主义越有利”的一种表现。此外，由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实业救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对于缓和劳资矛盾，加强劳工福利和社会救助，改善民生以求社会进步，也是有利的。不仅如此，实业救国还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概念，它必须涉及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因为发展实业少不了作

为培养专门职业技术人才及经营管理者教育，少不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即科学技术。对于前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教育救国的主要代表人物陶行知、张伯苓和黄炎培等，他们期望通过教育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进步，以拯救国家。对于后者，早在1903年即创办《科学世界》杂志的科学救国者认为，“发展科学基础知识，使吾民之知识技术日益增进”，并强调国家民族存亡迫在眉睫，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而实业则离不开科学技术。因此，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能将发展生产力与革命对立起来。从历史实践看，当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时，革命就成了中国人民不得不起而承担的历史任务，而在革命形势尚未成熟之时，扎扎实实地推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的阶级力量的壮大，为革命取得胜利积蓄着力量，建造着坚固的基础。可以说，民主革命强调了新的阶级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是完成中国近代化这一历史任务的必需前提，而实业救国思潮侧重和着眼的是发展经济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终体现。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大国，各种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是见仁见智。而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发展经济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首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发展生产力的革命而言，实业救国思潮所倡导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具有一定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根本性的历史特点。归根结底，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实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又为民主革命的孕育与发生提供了一种必要的阶级与物质条件。因此，只要中国近代化一日尚未完成，革命和发展实业这两面旗帜就都不能降落丢弃。况且，某个历史时刻，某个历史人物主要地倾向于革命抑或是鼓吹着实业救国，细究起来，皆“事出有因”，并非用“保

守”、“激进”这类帽子一扣，就可以解释清楚的。更何况，同一历史人物身上，往往两种思潮都在发生作用，简单化地看待历史，实在不足取！

最后，蔡双全之作不但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取得了具有开创性的宝贵成果，而且通过这一历史课题的研究，对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借鉴和启迪。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基本问题，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经常犯下令人心痛的失误，往往将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绝对地对立起来：要么不把革命看成是某种特殊的历史时期解放生产力的必须手段，夸大、斥难革命一度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和遏制（譬如如今在一部分学者中流行的“告别革命”论）；或者忘记了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行为视为破坏、反对革命的罪行。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一些领导人不能辩证地理解革命和建设的关系，片面强调了革命的地位，忽略和贬低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的意义，以致常常用“以生产压革命”、“唯生产力论”等吓人的帽子和棍棒来压制和打击要求遵循经济规律、大力发展经济的意见和主张，造成了令人痛心的重大挫折和失误。而在新历史时期，又有部分领导单纯强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轻视了民主政治建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酿成了若干社会矛盾不应有的激化和经济发展的受阻和窘困。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极大地妨碍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崛起，其教训都是十分深刻和沉重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经济的关系究竟如何才能摆正，依然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故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救国思潮，不但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

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当然，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由于受制于实际面临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一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

第一，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在与参照系相比较的过程中，才能对所考察的事物作出相对完整和科学的了解、认识。本书是将实业救国思潮放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来加以考察的，不足之处，在于作参考、对比的主要是原生型的欧美国家近代化过程，忽视了同在近代与中国有着相同、相似遭遇的亚洲国家（譬如日本、印度）近代化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诞生出的相似、相同的思潮的一种对照。如果能有的放矢地将类似思潮在日本、印度这类亚洲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加以对比研究，那么，作者对此的分析研究，就会显得更加丰满、深厚，更加凸显出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特色。

第二，毋庸置疑，民主革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确为近代中国两大主要思潮，其影响和作用足以左右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然而，除此之外，近代中国还产生和存在过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等诸多思潮和主张，有的思潮甚至一度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这些思潮，似乎不应将它们一概付诸阙如。如果能在适当的位置，用适当的篇幅，讲述、分析一下这些思潮与实业救国思潮的关系，不仅可以将时代气息渲染得更加浓郁、生动，而且，对读者进一步理解与认识实业救国思潮实为有利无弊之举。

第三，本书的若干论点，如将王韬、郑观应等这些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区分开来，视前者为“实业救国”论的“始作俑者”；推孙中山为将民族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自觉统一的第一人，都可视为新颖独

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可惜，作者对这些问题阐发得不够透彻，似乎大有继续深入开拓、论证的空间。

总之，本书在选题的确立、材料的搜集、论述角度的选择和论点的创新等方面，都较为成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作者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且具有探究真理的胆略和毅力，我希望他对这一重要课题继续研究下去，探索得更深、更广、更新一些，为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再立功劳。

2010年9月15日

于武昌珞珈山路涵新邨楚三斋

序 二

杨秀林*

时下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一批是青年学者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充实、修改、加工而成的，其中，颇不乏虽略显稚嫩却大有新意的佳品，蔡君的这本书就属此类。

蔡君选择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作为研究对象，让人易生“吃力不讨好”之担忧。何以？我认为思想史恐怕是历史领域内最棘手的难题。盖思想这个东西，缥缈得很。视之无色，闻之无声，嗅之无味，触之无形，如空气，如以太，如灵魂，而又充斥于人的头脑之中，磅礴于宇宙之间。西哲譬之为“光”，先贤强名之曰“道”。若论其力量，或较鸿毛轻：批判“旧”时，不能取代物质之批判，终有何益？缔造“新”时，流于乌托邦，岂有建树？对于个人，思想不能食、不能衣、不能夸耀、不能交易，人们多拜倒于金钱、权力、名誉、美貌脚下，鲜有钦慕思想者。然往往“旧”的维护者又视思想为洪水猛兽、十恶不赦：宣告其

* 作者系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退休教师。

罪状为“异端”，为“一言丧邦”，必欲焚坑之、铲除之而后快；“新”的追求者又视思想为黄钟大吕，猎猎大纛，非鸣之不能唤醒众生、集合队伍，非树之不能整齐步伐、行军布阵。而对个体，思想或催人高蹈，或诱人堕落，或化人为天使，或逼人为恶魔，全在一念之差。思想与时代、社会，孰为因，孰为果？仿佛是鸡和蛋到底谁生谁的亘古难题。况思想如逝者如斯的流水，如苍狗变幻的浮云，一种思想的底蕴究竟何在？哪些人可归于此种思想？一个人一生中的所有思想是否都属于此种“思想”？一个人是否终生不渝地服膺一种特定的思想？见仁见智，歧路追羊。有了上述种种缘故，研究思想史，焉得不困苦、伤神！

蔡君对于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研究，得失成败，自有文本在，读者诸君的目光在，不容我多置喙和饶舌。抒发一点浮想于兹，以酬蔡君索序，愿蔡君不惮毁誉，不畏艰辛，在布满荆棘和鲜花的求道之道上，继续奋然前行。

2010年10月20日

于湖北师范学院